

薪火相传

——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

王 昊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薪火 相传

——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

王 昊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薪火相传：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 / 王昊著. --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80688-855-1

I. ①薪… II. ①王… III. ①南开大学—人物研究②
南开大学—学术研究 IV. ①G649.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470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www.tass-tj.org.cn

印 刷：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0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代前言：南开大学史研究刍议	1
---------------	---

上编：南开学人研究	11
-----------	----

第一章 创校先贤	13
百年南开话严张	13
端正夫子说严修	18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31
晚景堪怜张伯苓	53
临危领命何淬廉	59

第二章 学术名家	68
陈省身先生的强国信念	68
杨敬年先生的豁达人生	84
郑天挺先生与南开史学	91
雷海宗先生的晚年岁月	101
朱维之先生行述	112
陈炳富先生与孙子兵学研究	121

第三章 学人留踪 126

外籍教师刘狄英的南开岁月 126

南开园里的“联大”老人 139

刘兆吉及其《西南采风录》 142

中编：大学使命与学术追求 145

第四章 大学之道 147

且说大学之道 147

论张伯苓的思想与事功 152

略论黄钰生的大学思想 165

试论陈序经的大学教育思想 172

第五章 学术追求 187

论私立南开特色学术的生成 187

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尝试

——以《财政学》成书为中心的讨论 196

论私立南开的学术传统

——以“边疆人文”学人群为中心的讨论 204

早期南开学生留日活动述评(1916~1921) 225

下编：方法、观念及其他 241

第六章 校史的写法 243

大学故事入史来

——从陈平原的“大学史”写作说开去 243

著史当如唐德刚 250

比较研究二题 256

第七章 校史的边角 265

百年纪念二题 265

且将韶华付兰台

——几位知识人的别样岁月 271

南开早期话剧漫谈 279

良师益友当如是 286

学者为人 292

漫谈校史教育 299

后记 303

代前言：南开大学史研究刍议

当前,中国大学正处于多元发展时期,随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大学内部保守与变革、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日渐凸显。因之,及时总结大学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提炼文化内涵、传承学术精神,仍是大学校史研究所要面对的紧要和迫切的课题。近一时期以来,中国高校新一轮的修史工作陆续展开,编纂出版了一批颇具质量的校史著作。与一些兄弟院校相比,南开大学建校九十多年来,尚无完整、系统的南开大学史、志出版,说明南开的校史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以往的南开校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相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大学史研究而言,则显现出定位不清晰、观点陈旧、叙事体例单一、研究方法滞后、书写模式老化等多重弊窦。实际上,南开大学史研究中暴露出来的不系统性、编述与研究比重失当,以及过于偏重对单一人物的研究,等等,都是制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因素。

—

校史(院校史或内部史),是对一所学校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探索和总结,发挥着鉴往知来的史学功能,也是大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上世纪80代末,由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写的《南开大学校史

(1919~1949)》仅记述了南开大学前三十年的发展史,解放后六十余年的校史还没有被系统和深入地加以研究,后一时期的校史,可谓资料漫涣,研究不成系统。从目前而言,能较为系统反映南开大学解放后六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相关成果仅为尚未正式出版的“南开大学纪事”。不能否认,解放以后,中国大学历经改造与调整,屡遭国家意识强势介入,以致在办学模式和主导思想上日益趋同,这种“千校一面”的状况给大学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不过,每一所大学“在特定时空下的学校历史,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写出具有学校自身特色的‘历史’,就更值得思考”。如果总结南开大学解放前校史编写的成功经验的话,“校史”及与之配套出版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尚有可圈点之处,其资料充分、取舍合理、体例整齐,均符合当时校史编述的要求,在同时期国内“校史研究”中处于较高水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高校陆续开始的校史编述工作与那时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勾连,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与重振学风,需要对以往的学术传统进行重新发扬,对学术资源进行重新梳理和整理,编述类校史著作的出现正逢其时。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编述类校史著述满足了“将那些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资料,经过整理、熔化的工作,使成为整齐划一的文体,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修史要求。编述类校史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给予经历了文化和教育断层的人们以莫大的帮助,使读者能够很快的重新认识和了解一所大学曾经有过的教育和学术传统。这种写作经验值得现当代大学史研究者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但在新时期中,大学史研究不是要在“打基础”的史料整理层面逡巡不前,而是要将研究更加学术化,要增加校史研究中的学术含金量,同时兼顾可读性、普及性。其实,造成校史研究学术性不强,难入学者“法眼”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已有学者指出,大学校史研究不被学术界所认可的尴尬境遇主要缘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使校史研究始终处于资料的搜集与考证、校史编写的较低发展层面”,要突破该领域的研究瓶颈,“应明确研究工作的学科定位”,即“定位于教育史,并以该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为依托,在史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处开展校史研究”。

无疑,将校史研究定位于教育史学科确实有助于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丰富其理论和方法,提升他们在学术界的“准入资格”。不过,昔日大学校史的编述经验早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下大学史研究的要求。还是从学科定位的角度来说,大学史研究已不同于以往的校史研究,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中国大学研究的深化,亦有论者指出,目前大学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领域被包含在高等教育史的范畴中,在客观上不利于对大学及其发展史的研究。因为“通常所理解的高等教育史实际上是一个广泛的领域,甚至中学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的历史都被纳入高等教育史的研究领域”,而“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在功能、结构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在生成、变化的过程上也具有显著不同”,所以大学史研究与通常所理解的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必然会在时限、对象、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就研究层次而言,大学校史和大学史研究均包含有两个层面,即对内部史(院校史)和外部史的研究,校史偏重于前者,大学史则统筹兼顾,从内涵与外延上深化和扩展了传统意义的校史研究。正因为大学史研究不仅关注学校内部的发展轨迹及规律,更与时代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知识和制度的变迁相联系,既可从微观角度入手重点研讨一所大学的学科、学术、学人,又可从宏观视角着眼,比较审视中外大学的异同、制度的变迁和教育理

论的发展。大学史固然与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方向有所重合,但其特殊性决定了大学史研究一定是处于多学科研究领域的交集之上,依此逻辑,就不难理解大学校史与大学史在学科背景下的差异。

检视以往的南开校史研究,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校史与教育史学科的关联,但校史的撰写还是比较多地关注对本校历史的考察,视域依然限制在内部史,并没有将它放宽到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学科背景之下。内部史或院校史虽然是校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基于大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校发展的差异性,在进行内部史研究时若不进行比较研究,忽视对国家和社会等宏观背景以及大学与区域发展、同区域间不同大学间之比较等方面的考察,内部史必定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一所学校发展的真实样态。比如,一向为南开人津津乐道的“美国经验”和“土货化”等问题,实际上还存在着可深入探讨的空间。南开建校之初,虽具“与欧美并驾齐驱”的雄心,但在现实层面偏重效法美国大学,忽视了欧洲大学的办学经验。问题是,美国模式并非尽善尽美,且不说二战前美国大学的总体水平其实较欧洲大学尚有一定差距。美国经验之于南开,尽管在“土货化”方针提出之后有所取舍与改造,但学校基本上走的还是美国化的办学道路。所谓“知中国、服务中国”教育理念的提出,也不过是美国实用主义中国化的一种表现而已。是时的中国教育,大到国家教育方略的制定,小至一校办学方针的推行,多以“实用”为标的,皆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和危机意识相呼应。“土货化”的南开实乃当时中国大学教育发展总体趋势下的必然产物,并非特例。一味突出或标榜私立南开贴近中国现实办学的经验,过分看重自家传统,正是目前南开校史研究囿于自家园地,缺少比较意识和宏观视野,以致水平难于提高的重要因素。

《南开大学解放前校史》出版逾二十年来,围绕南开大学所做的

研究,尽管成果数量不菲,但大多是就南开而论南开、就个人而论个人,整体上显得零散又不系统。不系统,就意味着无法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持续研究;而仅仅追求资料编辑的系统性,亦不代表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问题研讨的深化。编述类校史追求一所学校发展史的完整性,固然体现了一种“系统性”,但仅仅追求这种“史志式”的系统性是无法完成由校史向大学史研究层次提升的,也无法改变单一学科主导校史研究的思维模式。“由于教育史学科直接起源于近代教师教育的需要,因而长期以来,教育史学科是作为一门教学和培训的科目存在的。大学史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出现,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主要来源于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来自于对未知事物的疑惑。”基于大学史研究的学科特点,在把握教育史学科的基本方向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多重视角考察大学的发展,方有可能摆脱那种“见树不见林”的编述模式,从而达到多角度探讨制约或影响大学发展、变革等重要问题的目的。因为“从经济、文化、科学 and 知识发展等多重角度考察大学发展,有助于避免把大学史当作纯粹的教育史研究,从而把大学不仅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更看作一种社会机构、学术机构、文化机构”,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大学史的本质特征。将校史研究提升到大学史研究的层次,无疑将增加研究的学术性,提升研究的水平,同时也会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开辟一个重要的领域。

二

近20年来的南开校史研究过于专注于张伯苓个人,围绕该人物,一批相关的论文及论著先后发表或出版,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和学术影响力。但是,南开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不消说在南开历史上

众多的学人,就连南开的多位创办者至今还没有被很好的认识和加以研究。尤其是南开最重要的创办人之一、被张伯苓誉为“校父”的严修,私立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身兼南开大中两部教职的张彭春,在南开大学校史研究中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此三人在南开大学史上的重要性决不低于张伯苓校长,特别是,他们对大学的认知不只关乎南开大学的教育实践,还涉及到南开的“大学资格”问题。张伯苓校长在南开教育实践上注重实用,讲求实效,轻视人文学科的发展,在办学过程中并非一路鲜花与掌声,恶评亦有不少。南开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倾向曾被时人多方质疑,张氏这种以社会本位为主的大学价值观便与作为秘书长的黄钰生有着显著的不同,在黄氏看来大学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个人理智的发展与完善个性的功用,强调的是以个人本位为主的大学价值观。办学过程中,尽管黄氏的大学思想最终让位于张氏的大学理念,但这种以完善个性为旨归的大学思想还不时地会在南开办学实践过程中闪现,从很大程度上对南开“实用主义”的办学模式起到了救偏补弊的作用。通过对张、黄大学思想的简单比较就不难发现,多年来隐藏于校史中的看似无可置疑的问题竟大有可商讨之处。由于多种因素牵制,以往的校史类著述对所记录的人与事往往有所回护,或是因某种意义上的需要,论人论事,不免偏重偏轻,略去了许多重要的环节和关键点,但是这些环节勾连甚紧,一旦缺失,便会造成史迹的模糊,终会使后人在解读和解释上发生偏差。张伯苓研究之于南开大学的重要性无可厚非,在进行南开大学史研究时应予特别强调,浓墨重彩亦不为过。只是这种一人独大的研究取向需要加以改变,必须对南开学人群体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研究,至少应先在合理的研究范畴内构筑起南开学人的肖像群,将丰满、生动的南开人物群像

展现给世人,将一个学术的南开提升到重要的研究位置。

新时期以来,一些以大学、学术机构或学科为个案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有立足微观、以小见大者,亦有留意宏观比较、尝试跨学科研究者。前者如台湾学者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中山大学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为代表,后者以四川大学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49)》为代表。此外,还有学者从都市空间、文化空间的角度来研讨近代以来的学人群体;有从现代学术视野角度考察留洋学人,进而探讨东西方大学思想、学术体制的变迁及相互关系;有从近代中国的知识和制度转型入手梳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相应的发展变化;有从中西文化、国立与私立比较入手探讨大学制度与理念的变迁及影响,凡此种种表明,多领域、多角度、多层面围绕大学这一兼具社会与文化功能的机构而展开的学术研讨已经成为大学史研究新的生长点。

当下,南开大学史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亟须进行的应是研讨南开的学术体制、学科发展变迁的基本特征和学人群体的学术旨趣,关照大学思想、教育理念、大学职能的嬗替,实事求是地评价南开的教育特色,客观地总结经验、承认不足,从学科与学人的视角重构南开大学史,而不需要反复、空洞地申说有而不在的南开精神。南开精神可谓脉于肉中、神藏于形,只有从学科与学人的角度入手,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南开特色学术生成的机制,深入研究南开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大学对都市文化空间建构的影响、南开学人群体与现代学术之关系,等等,才能从中体悟南开精神之所在。南开大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

位,民国时代的私立南开固然只是一所规模不大、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大学,但南开学人对现代大学使命和学术的认知有着独特的理解,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南开学人占有重要一席。比如说,南开作为一所追求“实用”的大学,建校之初不设中文系,虽遭到一些诟病,但在延聘人才方面却有着较为灵活的用人机制。对于人才的选用,南开和清华便可进行比较研究,两校用人判然有别,清华倾向于资望,选聘教师注重其人前期的学术积累和从教经历。南开则敢于起用青年学者,给他们提供较为稳定的教学与研究环境,使他们能在政潮起伏、时局动荡的社会里安心从事教育工作,为他们后来的学术进展夯实了基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如蒋廷黻、萧公权、李济、汤用彤、饶毓泰、陈省身、吴大猷、江泽涵、李继侗等人早期的学术积淀均与南开有着极大的关系。南开、清华的教员选聘标准与条件之着眼点相异,固然与学校办学实力和教育理念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但还牵涉了更为关键的问题,若进一步探讨,便可发现大学教师的选聘及其制度的变化关系着民国时期学者们自由流动和迁转的方方面面。1930年代,私立南开学人群经过早期的分化、调适与整合,渐渐定型于两类学人,一类属于基础研究型,多以理科学者为主;一类属于调查研究型,多以商科、工科、文科学者为主。南开较为规整的学人群体的形成,实乃奠定了南开特色学术的基本班底。对大学学人群体的研究是将对人物研究单一化的模式打破,将大学及其学术机构、学术思想真正融入到现代学术进程之中。毕竟,学人群体关联着学者的师承和流派、学术制度的形成和沿革、学术理念的塑造和坚守,可以说每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史都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大学的兴起与留洋学人群体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中

西学术思想、教育理念的交流与碰撞几乎无一不与此群体有关。该群体之于南开,不仅影响与左右了南开的学术风格,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南开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留洋学人群体本身所兼有的东西方文化特质在大学的实践中就体现为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两种文化的纠结始终贯穿于南开大学的发展进程中,反映着南开创建者和学人们在追求大学及其学术本土化方面的不懈努力。在当下大学办学路径日渐相似的背景下,从学术和学人的角度入手重新发掘南开的大学理念、办学机制、学术传统,从中释读学校的特色何以形成的深层原因乃是新时期南开大学史研究的核心所在。旧例重提,在近代中国的制度和知识转型过程中逐渐蜚声海内外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养成显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南开的应用化学研究则瞄准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关注民生,积极促成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现实服务。私立南开大学所以能在强手如林的民国大学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这与南开在经济学和应用化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而南开学人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不言自明。如果遵循传统校史写作的模式,仅停留于史实层面的资料编述与概括,依旧从现象到现象,轻视对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形成与发展、中西学术观念及方法的移植与转化、大学与城市互动机制等问题的探讨,那将无助于我们体会南开经济学何以能在当时“独步国内”的深层原因,也无助于深入了解南开应用化学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基于上述的浅见,私意以为讨论南开大学史必须论及中国现代大学思想、教育思想的流变,要梳理南开大学学术制度建立的过程,要关照南开学人群体的学术旨趣与倾向。这其中,首要明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必须对大学思想与大学教育思想有清晰的辨析。大

学思想是人们对大学这个文化与社会机构本身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本质、存在价值、大学职能、大学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关系、活动原则和基本精神等问题的回答和看法;大学教育思想是对大学里从事的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活动及其关涉问题的基本认识。从外延上看,大学思想比大学教育思想更加宽泛。无疑,在大学创设与发展过程中大学思想才是办学和一切教育活动的源泉和指导,循此思路研究南开大学的办学规律和文化教育脉络,既不能单纯、线性地描述学科及学术机构的变迁,也不能停留在对其人物大学教育思想的归纳和总结上,应扩展文化比较的视野,从制度层面深入到思想的层面,再由思想反观制度的变迁和学脉的流转,去理解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区域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大学及其教育现象。惟其如此,新时期的南开大学史研究才会充满活力,才会增强自身的学术性。

本文曾发表于2010年第1期《南开教育论丛》,收入本书时,内容略作了修改。

【参考文献】

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王学典:《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张斌贤:《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

陈均:《高校校史研究发展方向探讨》,《兰台世界》2007年第12期。

上编：

南开学人研究